



博雅名家讲坛

B Y M J J T



韦政通 著

八十前后演讲录

韦政通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韦政通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博雅名家讲坛)

ISBN 978-7-5622-4113-3

I. 韦… II. 韦…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905 号

### 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

---

作者:韦政通©

责任编辑:龚琼芳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 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25千字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3.75

版次:2009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30.00元

---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一：创造的人生

何怀硕（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教授）

韦政通先生真正著作等身，要领受他的学问，得去读他的著述，自可得到启发。这本《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出版者要我写序，我不想谈与本书相关的话题，而谈谈这位作者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因为主菜上桌之前的小菜，必完全不同于主菜，才能挑起食欲。

我平生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遇，其中之一就是有许多“忘年之交”。叶公超先生与梁实秋先生，应该是太老师辈，但视我如友生；韦政通与文崇一、胡佛、杨国枢，应是老师辈，但数十年待我如友棣，且变成老友。这种撤去等级、伦理的藩篱，纯属心智性情的交情，对“后生”者的鼓舞与濡染特别深刻。我一生受惠于高明，心中常怀感幸。

世人大多以结交有显赫头衔、名利场中得意的人物为荣。但一时闪闪发亮的“名流”，不择手段的张扬，很快便如泡沫。智慧常藏匿于僻静处，发自欲僚沉藏之人。不畏孤独，是一切有成就者重要的禀赋。在知识之海中潜泳，发现与颖悟的喜悦使人自甘孤独。德国诗人海涅写康德穿灰大衣，持手杖出现家门，然后往菩提树的林荫小径去散步，邻居就知道准是下午三点半。这个故事太有名了。我的哲学家朋友韦政通生活作息的严谨、守恒近似康德，拘絮、单调，却造就深刻、丰富，这大概也是奇妙人生中又一个“二律背反”罢。

我有两位都年过八十的“老”友，他们的书房与书桌，显示了紊乱与秩序两个典型的极端，但他们一样极有成就。一位是夏志清，一位是韦政通。政通兄的条理与整洁，我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人可与他相比。他的读书索引用废纸背面书写，用铁夹分别夹齐。他书桌上的各

种东西，好像军队布阵，条理井然。他写出一本一本的著作，在他的书房中，有如手工业者用水滴石穿的工夫，计日可待。多少年来，他的作息，恒守严谨的规律。何时起床，何时开工，何时睡眠，午后有数十分钟的沙发上小寐……几乎是数十年如一日，自己发命令，定规则，自己遵行，却从容自在，欢喜承受。他一生在读书、思考与写作中确立了生活的意义。最近这一年，政通兄重听，目力减退，手颤而影响写字，他为不能像以前读书、写作而苦恼不已。我劝他要另创一种生活，享受另一种人生。他是那么一位以全副心力在工作中建构生命价值的人。过去我认识他几十年中，从没看过他因人生的挫折而丧志。不停地追求，不停地工作，他的执着、恒心与毅力，很多人做不到，这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政通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有一本自传性的书——《人是可以这样活的》（2000年台北洪叶出版）。要了解一位自我追求达成崇高目标的学者，应一读该书。一个人如何形塑自己，创造独特的个性，然后立大志，再以无比的恒心与毅力坚持到底，所以成就非凡。这些说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人要实行，困难万分。如果怀着功利之心，不能在无尽的孤独、寂寞的书斋中，视矻矻穷年的工作为快乐、为至乐，必走不下去。政通兄一生展示了一个以辛勤用功为乐的学者典型。

上面说政通兄的个性与人生近似康德，但康德一生没远离他所诞生的哥尼斯堡，更没出过国。政通兄工作每告一段落，常偕妻子到世界各地漫游。他平日生活简朴，出门却不惜花费，享受现代文明的好处。他不是封闭于书斋中的学者，他饱游饫看，喜欢结交朋友，讨论问题，尤其喜欢勉励青年后进，协助他们成长。前几年他把一生收藏的书籍捐赠给杭州师范大学，而且应邀到大陆多间大学讲学。他一生好像牛一样耕耘，贡献他的智慧与成果，亦以奉献为乐，完成了一个有为的丰美的人生。

老朋友最后这本“演讲录”让我有机会写这篇小文，来表示我对他一生的欣赏与钦佩，我很感荣幸。政通兄启发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个人创造出来的；只有创造的人生才是最值得活的。愿与天下有志者共勉。

2009年5月4日  
于台北

## 序二：秋未尽，蝉不得不鸣

王立新（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万千偶然性聚合的结果，稍有一点错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可能是别人，而不再是自己。因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绝对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立个体，他必须通过绝对的不同，来表现自己独特的品格。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他的一生，也就只能混迹于生存之中，冥然无觉，猝然空过了。

先生是一位极具个性品格的人，而对于这种天生的独立性的品格，又很早就具有了明确的自觉，这是先生之为先生，先生之成为先生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和动因。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这种强烈的个性冲动所驱使，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道路。先生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在我看来，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该认识的都认识了——指结识新儒家阵营中的主帅们和自由主义的领袖等人物，从而受益于他们。而是他对自己的个性——属于自己的独立性品格，很早就有了充分的自觉，正是这种独立性的品格，使得先生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学术、思想道路。而结识这些大先生们，也正是因为自己独立性的内在品格的导引和驱使，才使得他追求精神成长，从而追随这些具有强大精神感召力的大贤们。没有这种内在的强烈的独立性的品格，他也挣脱不掉这些磁力极强的精神强者们的吸附，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道路。

先生仰仗自己健康的身体和强盛的精神的保障，通过顽强奋斗，终于打拼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生路”，在思想史、哲学、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伦理学方面，可以独成一家，其对传统伦理的客观分析、其

对现代伦理的重新建设方面所作的建树，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现世热情和历史责任，都可以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流下去。

先生虽然著作等身，但却从不炒作旧饭，独立的性格，使得先生不断求新，这是先生为学的个性；通俗易懂、简洁生动、言不虚发，则是先生的文字表达个性；对后学晚辈，极尽启发推勉，态度诚恳，热情洋溢，不厌不倦，亲切至到，这又是先生作为老师和长者的个性。与引水自灌家田的很多学者相比，先生从不为自己所立之说而拼凑材料，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形出发，历史的本真，即是先生立论的基点，现实的需要，则是先生致思的动因。

先生勤勉不懈，忘我工作，年逾八旬，仍然有年轻人的热情和干劲。好学不厌，诲人不倦，每日手不释卷，随时随地启发青年、提携后学。近年来，先生不断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不辞辛劳，分别在北京、台北、武汉、杭州、广州、南京、深圳等地发表演说，大陆地区众多青年学人，多蒙教益。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奉献剩余价值”。现在的这部“演讲录”，就是先生近三四年来在上述各地为青年学生开设的各种专题演讲的集粹，其中《儒家伦理观念的新检讨》、《儒家伦理的演变及其在近现代的命运》、《儒家、儒学、儒教》等，是对儒家传统伦理的进一步探索，主要涵盖对儒家伦理中一些与现代精神不相一致的东西的反省与批评，和对儒家伦理资源的重新认识与发掘等内容；《墨家的侠义精神》，则是对墨学中经常被忽略的“侠义”精神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表现等的梳理。通过这种梳理，说明墨学的主要精神，不只是经验主义和逻辑思想，而且包括匡扶社会正义这样一个重要方面。学术界一向以墨学自战国以后基本中断为“默认”的事实，但先生却看到了历史上的豪侠人物、帮派团体甚至政治领袖身上都在体现墨子所倡导的“兼爱”与“非攻”之义，墨家的这种“义”，虽然不像儒家的“义”那样大公至正，但却经常是黑暗时代里的光明，是无情世界里的有情的声音。这些侠士们，常常扶持良善、惩治奸恶，往往是身处下层受尽欺压但却无地伸冤、无处诉苦的广大民众的正义使者。先生据此认为：如果不仅仅站在学术和思想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那么就会看到，墨家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一直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其在下层社会里的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在主流社会里的影响。

以上是对于传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部分。先生还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针对青年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他们如何确立为学之志、如何

耐住为学的艰苦、如何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如何撰写学术论文等等，教导他们用自己有效的学术研究工作，参与到“以文化创新重塑中国形象”的伟大事业中去。先生以《霍韬晦先生的志业》为题，表彰霍韬晦先生为文化事业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精神。《牟宗三先生生活片段》，是先生回忆跟随牟宗三先生的岁月，在表达自己感戴师恩的同时，教导现在的学术青年，将来怎样做一个好老师，既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同时也表明了先生对教育的希望，用心可谓良苦。先生还以《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对现代教育整体滑坡的忧虑，也抒发了自己对于教育更加“教育化”的祈望。所有这些，用心的读者都可以在字里行间清晰地体会到。

先生本不愿请人写序，但因运笔之手，时有不仁，故有此是命。晚生虽愿代劳，但自知德薄识浅，才学均不足以堪此任。但是既承此命，惶恐之余，只能写下上面一段文字。

记得船山在《七十自定稿》自序中有这样一句话语：“秋未尽，蝉不得不吟。”冒昧借用，篡改词句，借以抒发己意。

秋未尽，蝉为什么不得不鸣？

其一，这是天命。蝉自出土即鸣，直至秋尽而止。秋既未尽，蝉如何能够不鸣？鸣，是蝉所承之于天命的本性，鸣，也就因此成了蝉的使命。不鸣不为蝉，既是蝉，就不能不鸣。中国知识分子，自打孔老夫子开基、创业、垂统以来，就如同蝉一样，被定下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命运，既无法逃脱，亦不必逃脱。这是他们独特的鸣叫方式。

其二，这是责任。天既命蝉而使之鸣，则鸣，便不仅是蝉不得不如此的宿命，蝉以鸣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又以鸣来表达自己的责任。宇宙间既不能不有蝉鸣，那么自觉的鸣叫，就是责任，就是崇高。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工具，包括人，甚至尤其是人，都是上天用来完成自己实现真、善、美使命的工具。盲目而被动地充当工具，那是无明，那是暗昧；主动地、自觉地充当天的工具，就是崇高，就是责任，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其三，这是自我安顿和自我安慰的良方妙法。蝉不鸣，则不足以自我玩味、自我慰藉，蝉以鸣来告慰自己：这是快乐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思想家和学者也一样，只有不间断地学习和不停顿地思索，才能自我安慰、自我提升。舍此，没有另外的途径。获得多少成就，似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停地努力，每有进步并且乐在其中。这

才是学者向学不倦、乐此不疲的最深处的动力。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学者要有内在的激励机制”的要诀，其实也正在这里。孔颜乐处，不是乐道，而是乐在求道之中。乐道是责任，乐在求道之中，才是境界。

先生年高若此，依然不改其乐，不仅责任情怀深重，而且境界高远难及，实在是可敬可爱之至。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多年来追随先生，每得瞻谒，便有如沐春风之感，其要义原来正在这里啊！

是为序。

2008年11月23日  
于深圳大学文山湖畔



# 目 录

- 001 序一：创造的人生……何怀硕  
001 序二：秋未尽，蝉不得不鸣……王立新

## 传统与现代

- 003 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017 儒家伦理观念的新检讨  
036 儒家伦理的演变及其在近现代的命运  
050 儒家·儒学·儒教  
059 墨家的侠义精神：墨学研究的新视野

## 职业与志业

- 071 学术研究对人生的影响  
099 生存、生活、生命：人生意义三阶段论  
112 职业与志业：新一代学者的未来愿景  
120 我治中国思想史的经验  
134 论文写作方法

## 文明与品格

- 155 观念参与和社会实践：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  
166 文明与品格  
179 以文化创新重塑中国形象  
184 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  
189 牟宗三先生的生活片段  
201 霍韬晦先生的志业  
209 编校小记……何卓恩



# 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003年12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各位同学，非常高兴能来东南大学参加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的演讲活动。今天的这个讲堂虽然不很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相当的盛况空前。时过境迁，台湾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情景了。

严格来说，我今天讲题目可能对于已经在从事中国思想研究专业的人比较合适。因为我讲的这个“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研究中国思想的人的一个理想。我今天的演讲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谈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一直到我现在所做这个创造转化，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特色、贡献和缺陷；还有一部分就要谈谈我从事中国思想研究工作的一点心得，也就是从事中国思想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点个人的经验。

在演讲正式开始前，我必须说说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意识。我们在学术上所谓的问题意识，就是你从什么问题出发？一个人要从事一项学术工作特别是从事思想性的工作，他一定有自己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老师教给你的，也不是朋友谈出来的，而是你自己从学习研究的整个过程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个问题主导你所研究的工作。我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会从事今天的这个研究方向呢？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中国思想传统还值得发扬光大的话，那我们就必须使中国传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面临的所有问题上接受考验。你自己说你的传统文化很伟大，你说你的文化很了不起、很令人骄傲，但这得接受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问题的考验。也就是经过考验以后，还发现你这个文化传统确实有价值有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赋予这个传统一种新的价值、新的意义，这就是我从事这个研究工作的意识意识和出发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个研究工作的理想在哪里？简单地说来，现在中国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也许20年后我们的经济就会腾飞，同时科技也发达起来，在这种成就下我们还希望中国人以及我们的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它深厚文化传统的特色。现代化的许多基本条件，我们也许慢慢都会达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在我们达到现代化以后，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色是否还存在？目前这是个疑问。当然，我们现在都在努力，像这次东南大学举办的大规模的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就是这方面的举措。我们希望在中国经济发达以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提升以后、中国技术也不落后以后，我们中华文化还能够发扬。由于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它的人民都应有特色。欧洲人跟美洲人是不同的，拉丁美洲人跟亚洲人也是不同的。西洋人看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他们看不出什么差别来，但是我们自己还是可以看出差别的。这个差别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因此，我们希望中国人将来实现现代化以后还能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也能保持中国人应有的气质。

这里讲一些题外话，目前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在国外是有问题的。我受到最大刺激的一次就是1989年跟观光团到欧洲的奥地利去旅游。那时大陆出国的人还不多，台湾出国观光的人数却是相当惊人的。在奥地利的一个度假饭店里，我竟然看到一个条子压在一个烟灰缸下面，上面用中文写着一段话，大意是：“这个烟灰缸是你拿走的，其他东西请你不要拿走！”可以想象，中国人中，可能有人喜欢把宾馆里的小东西带回家去。大家想想，1989年能够去欧洲游玩的家庭，经济实力一定不弱，我记得那次去欧洲游玩总共是23天，花费至少也得（用人民币计算）3万元。但这些人就有一种贪小便宜的习惯，因此给外人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此外，还有在高级宾馆里大声喧哗，穿着睡衣四处走动等等，这些形象都是非常不好的。我因为经常思考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学术问题，所以我的感受就很深刻。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谈谈中国思想传统从“五四”到现在的创造转化的四个阶段。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讲，只能大概地提一提了。第一个阶段就是新文化运动时代，这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也就是思想史上所称的西化派主导的时代。在西化派里大家都熟悉的主要人物有陈独秀，这是当时反传统的首席；其次是胡适；然后是提倡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这几个是当时反传统里面最有名的。以陈

独秀为主，他们反传统的主要思考模式，第一个是认定儒家传统与民主科学是对立的，互相矛盾的；第二个是认定中国的家庭主义和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矛盾冲突。所以他们提倡民主科学，同时也提倡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问题相当复杂，如果要讲的话是可以作为专门的题目来谈的。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个人主义，包括毛主席文献里面所讲的个人主义，应该说都是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个人主义不是自私，也不是自我主义，它代表思想的独立和自主。第三个认定就是中国传统的礼教与民主社会的法治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第四个认定的是中国传统的“定于一尊”与现代来自西方的多元主义冲突。“定于一尊”指的是中国从汉武帝以后，把儒家放在“独尊”的位置，就是儒家是老大，要使儒家的礼教在社会起主宰作用，而且通过政策来实现这一点，而现代文明是主张多元主义的。陈独秀的这些假定都是有问题的，是值得批评的。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要避免黑白分明的两分法，就是非黑即白，这在极权主义的思考里面就是如此。因为两分法能够挑起一种激情，因此常常在政治宣传上被利用，但这个对于从事学术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忌讳。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台湾和香港发展起来的、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也曾流行的所谓当代新儒家。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留在大陆而未到台湾的熊十力先生，和他的几个流亡港台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等。我现在很简单地说说牟、唐、徐这几个人的特色。他们都是我的师长辈，我的思想就是从他们这几个人的背景出发的。牟宗三是哲学里面的形而上学家，他基本的理论骨干是在这方面。唐君毅哲学工作的特色在于他是从事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西哲学的比较是他思考的特色，然后再讲会通。徐复观先生写两汉思想史、写古代人性史，他所写的《中国艺术精神》特别有价值。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了解竟然是那样透彻，这是很少见的。徐复观的好几本书现在在大陆也出版了，昨天我在新华书店里也看到了。

“五四”反传统的西化派对启蒙运动确有贡献，但对于重建传统却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因为他们对传统并不认同，是反传统的。而新儒家的一大贡献就是把传统从反传统的潮流中挽救回来，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恢复了对传统的信心。这个挽救差不多花了30年的时间。现在没有一个从事哲学研究或思想研究的人会无知到虚无主义地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糟糕的，都是应该否定的。另一方面，新儒家虽然挽救、纠正了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潮流，但是当他们面对中国的新问题，例如

面对当代民主、面对科学的时候却缺乏相应的思考。新儒家对民主的思考、对中国当代民主的发展没有自己的贡献，对于科学更谈不上。因为他们还是肯定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思考模式，认为中国的未来还要走内圣外王的路子。所谓内圣外王，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一个国家的君主或是有权势的位置应该由有德者去做，所以圣人当皇帝，贤人任宰相。这样的理想，各位想会达到吗？这是永远达不到的，因为这是经验上的不可能，是幻想。有的东西是经验上的不可能，也就是说在世上是永远不可能的。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人类的有些事情一直被主张，但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有可能你们不赞成：自古以来多少人主张人类的和平，一个提倡和平的人常被人们歌颂，说这个人好伟大、人道主义等等。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人类和平的目标其实也是经验上不可能的，事实上永远不可能。人类永远生活在不断的战争、不断的斗争中。原因在哪里？基于我对人性的了解，人性并不像儒家所讲都是性善的，主宰人类历史的那种人性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负面人性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灾难。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代化的冲击。讲到现代化，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大陆很流行，只是现代化理论在台湾早流行了20年。现代化理论主要是美国提出来的一系列理论，因此实际上这当中美国化的成分极大。大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美国现代化理论最为流行的时候，很快流行到中国台湾。现代化理论与西化派相比长处在哪里？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现代与传统不再对立。现代化理论肯定了人类普世的价值，例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它肯定了自由化里面的普世价值，同时用普世的价值来检讨传统。所以凡是讲现代化的同时又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者都在思考，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产生的。这个题目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做的人太多了，与“五四”反传统比较起来算是一大进步。同时，也和新儒家不一样，它代表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来考验、检讨传统的价值。

第四个阶段就是创造转化。为什么“创造转化”在最近不断地被提出来，而且我的一部著作的书名也用“创造转化”，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它可以整个改变过去几个阶段的缺陷。创造转化代表一种什么意思呢？最主要的就是它不论是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对西方的传统，甚至是对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要经过一个批判的过程去吸收。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是像新儒家那样把中国文化过分自夸。新儒家认为将来人

类领导文化的主角就是儒家，在这个时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作为一种信仰是可以的，而作为理性的思考是不可靠的，在学术层次上得不到同情。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的、大家相互尊重的文化，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主导这个世界，现在这个趋势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美国再强大在文化上也不能主宰这个世界，回教的世界就是极端轻视美国文明的。回教的人口数量相当惊人，有十几亿，他们就是极端排斥、轻视美国文明，并不像我们这样歌颂美国。所以我认为创造转化经过中国一百多年革新的思想之后，经过许多变化之后，它是比较健全的一种心态。但仅仅有一种心态是远远不够的，创造转化的工作如何做得出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这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是需要好几代很多人朝这个方向努力才可能做出成果来的。

下面我来谈谈我自己对从事这个工作的一点心得。我把这一部分称为迈向创造转化之路。

一个人如果有志从事中国思想的研究工作，如何走向创造转化之路？第一步要培养一种跟随的能力。我们的思想绝对不是凭空而来，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这次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中提出要学习中华文化的经典，学习经典就是跟随前人伟大智慧的脚步向前走。最恰当的学习就是跟随，亦步亦趋地真正学习前人的东西叫做跟随。在研究工作中，你不要一开始就自己乱发议论，你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学习别人的思想，学习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家是如何在思考，你必须努力学习和熟悉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的思考方式，这就是跟随的能力。严格来讲，我们一直学习到博士阶段都是在训练人的跟随能力。一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要提出什么创见大概不太容易，多半是学习跟随。就是我能够真正把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精华如实地找出来、把它讲出来、把它发挥出来，重新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表达，这就是跟随前人做真正的了解、深入的了解。

从跟随然后到自我探索。所以一个好的博士生或者好的博士生导师都应该有这样的期待，这种期待也许不能达到，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除了跟随以外，你还要学习独自探索的能力。一个人独自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要在博士阶段训练出来，以后不要老师指导你还是可以从事研究，这种自我探索的能力要培养出来。这本是一个好的博士生阶段中应该给予的，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却只是一个理想。我们现在的教育，包括在台湾要做到这一步都不容易。现在有个风气，因为就业困难，所以许多人如果家庭经济许可的话，大学

毕业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到学校读硕士，硕士毕业找不到工作就读博士。台湾这么小的地方，读研究所的人超过10万。你想想多可怕，如果外面就业情况不是那么紧张的话，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可以不读研究生的。他们中很多人对学术根本没有兴趣，真正愿意为学术奉献的自古以来都很少。因为这需要一些特殊的磨炼，需要有一种坚持文化理想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愿意为学术奉献的人永远是极少的。

对研究生的训练有多种方法，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教导研究生的方式。我在台湾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也许大陆已经做过，就是你每读一部经典，你就必须交一篇读书报告来，报告就是你这个学期的分数。当学生把报告交来以后，可选择好的报告再加以探讨。在台湾，我们曾经尝试过一个方法，就是找一个有成就且真正对这个报告充分了解的教授来做读者，阅读这个学生的报告。然后解剖他的报告，把他报告中的长处和缺点都给他讲解出来，在我的经验当中这种方法对学生的帮助很大。对于学生来说，有这么好的师长来读他的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再加上对文章加以严格仔细的审评，学生的收获也很大。在台湾召开学术会议，比较严格。任何一个人在宣读论文以后，都有一个评论人对他所宣读的论文加以评论。评论人通常评论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但是在台湾“清华大学”对于学生的习作的评论却是花费50分钟的时间。这对于学生来说是极大的鼓励。

我们有很多人做学问往往过分地迷信方法，认为有了好方法一定能做出好学问。中国传统讲：“诗无达诂，史无定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诗没有一种普遍承认的解释。“诗无达诂”就是对于一首诗，你读的是你的心得，我读的是我的意义，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诗是有多种解释的。“史无定法”就是历史没有一定的方法。现在过分强调方法的人把方法当做万灵丹一样，仿佛有了方法学问自然就做出来一样。我自己的经验是方法因对象而不同，每做一篇论文、每写一本书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不论用什么方法，问题是你能否把你希望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我们学历史的人一定会学一点历史方法论，中国近代讲历史方法论的书大概就是 from 梁启超开始的，讲得也很精彩。因为梁启超读史书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就可以把自己的经验讲述出来，供别人参考。我觉得方法论的书在从收集材料一直到下笔为止这个阶段是有用的。比如如何收集材料、整理材料，这些都可以参考。但是等你下笔以后，要表现你个人的特色，这时的方法就靠你个人独创了。方



法的重点是你要讲什么，能否讲得很好，能否讲得透彻和恰当。如果都能做到，这就是好的方法。反之，就不是好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我就有一次遇到方法上的困难，写《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这是作为大学里开设的一门课程的教材使用的，这门课程肯定是中国第一次开设的，把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思考。我原来习惯使用文化思想、历史的观点来写，因此写得完全不对，与生活根本联系不上。写了大约 10 万字以后，发现几乎变成思想史的概述了。为什么与生活联系不上呢？就是方法用错了。因此，为了寻找一个适当的方法真是晚上都睡不好觉。后来试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参考一点心理学的观点、社会学的观点、人类学的观点，重新来处理。因为讲社会生活离不开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知识，要学习它们的一些观点，这样一用的话就把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被方法所困扰的经验。因此，你要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方法，能把你所要表达的东西讲出来就是最好的方法，它是因对象而异的。方法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累积起来的，方法是这个意义上的。

讲创造转化，创造在我们研究生涯中内在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呢？我个人的经验的第一点可以用朱熹的一句话来形容：群疑并兴。我们一个人从事学术研究一定先相信很多东西，才能前进。假如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个老师，你就没有办法跟随他做研究。但是你自己做了相当的一段时间，比如 10 年、20 年，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对什么都发生怀疑，什么都发生问题，这叫做“群疑并兴”。假如你内心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表示你正有大进步。你过去相信了很多，很多的思考就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突然这个时候你要在此基础上突破了，这是好事。但是有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胆怯了，认为这样一来会得罪老师、朋友。假如你有这样的顾虑，你就停顿了。一个真正对学问有真诚的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得罪老师也不要不在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古老的话流传了两千年，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大家可能会想到，如果得罪了老师，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这时你对利害的考虑就会比较多。真正做学问的人，利害的考虑是比较少的。“群疑并兴”就是一种产生创造意识的可能性的心理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非常地恐慌，因为你对过去深信的东西发生了疑问。我个人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我原来非常相信新儒家的东西，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我一直沉醉在新儒家的这些人的想法之中。可是，后来我开始在心理上对这些东西产生了疑问，这些问